世界经济统计学2019年最佳论文TOP10评选：候选论文摘要

　　《世界经济年鉴》编辑部，2020.07.10

　　（一）世界经济统计学2019年最佳中文论文TOP10候选论文

　　【SC01】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探讨　　李金昌、史龙梅、徐蔼婷（2019），《统计研究》，第1期，第1-14页。

　　党的十九大作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重大判断。测度高质量发展的前提是,在准确理解和把握高质量发展内涵的基础上构建一套科学合理的评价指标体系。通过对高质量发展统计内涵的深入考察,本文在充分梳理、借鉴国内外有关同类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从"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这个社会主要矛盾的两个方面着手,构建了由经济活力、创新效率、绿色发展、人民生活、社会和谐5个部分共27项指标构成的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该指标体系的特点是:紧扣高质量发展的内涵和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指标数量不多但覆盖新发展理念的各个方面,指标不重复,数据易获得。

　　【SC02】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相对地位的演变(公元1000—2017年)——对麦迪逊估算的修正　　金星晔、管汉晖、李稻葵、BROADBERRY Stephen（2019），《经济研究》，第7期，第14-29页。

　　一个文明在世界上影响力的重要测度是其经济活动在世界经济中的相对地位,因而深刻认识中华文明的历史影响力以及1978年以来改革开放对中华民族复兴的意义,有必要对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相对地位的演变进行长时段研究。已有研究大多引用麦迪逊估算,其准确性值得商榷。本文应用国际学术界前沿的历史国民收入核算方法得到的最新世界各国GDP数据,结合中国原始历史记载,大幅校准了基于麦迪逊人均GDP猜估值得到的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相对地位,重新认识了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相对地位的演变。研究发现:第一,公元1000—1978年,中国GDP在世界总GDP中的比重先升后降,峰值为1600年的34.6%,而不是麦迪逊估算的1600年和1820年两次高峰,1600年34.6%的峰值高于麦迪逊32.9%的最高峰估计。西方国家工业革命后,中国GDP在世界总GDP中的比重断崖式下降,1952年和1978年分别仅占5.2%和4.9%。第二,改革开放后,中国GDP占世界GDP的比重迅速恢复,2017年达到18.2%。第三,以人均GDP衡量,中国从18世纪上半期开始,生活水平开始落后于主要欧洲国家,中西大分流已经出现,而非加州学派认为的工业革命后。本文研究表明,1978年改革开放开启的是自公元1600以来中国经济的首次历史性复兴。

　　【SC03】价格数据缺失、失真与PPP测算偏差　　黄雪成（2019），《统计研究》，第6期，第15-27页。

　　基础数据质量问题对PPP测算结果的影响既需要有定性的客观认识,更需要量化的测算结果做依据。本文首先依据数据审核的基本逻辑将价格数据质量问题抽象为数据缺失和数据失真两种类型;其次借鉴对照实验方法,以CPD法为基础,通过对两类数据质量问题不同形式和程度的量化模拟,综合考察了两类数据质量问题影响下的CPD-PPP测算偏差特征与规律;最后综合模拟测度结果为ICP基础数据质量的控制与优化以及比较结果的量化评估与调整提出了意见与建议。

　　【SC04】一种改进的地区购买力平价指数　　陈梦根、胡雪梅（2019），《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第8期，第147-164页。

　　研究目标:测算中国地区购买力平价,反映不同地区之间价格水平的差异。研究方法:以2016年110种代表规格品价格和居民消费权重数据为样本,采用改进的CPD-EKS两步法,测算中国31个地区PPP。研究发现:产品价格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性,传统计量方法下估计的PPP结果可能有偏;在位置邻接性、距离远近、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开放度等诸多影响中国地区间价格差异的因素中,距离是现阶段地区价格产生空间关联效应的更显著因素;价格结构和经济结构的地区间差异对地区PPP会产生显著影响,采用国际通行计算方法可能会低估价格水平;中国地区PPP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性,大致呈现东部地区价格最高、西部地区次之、中部地区和东北地区价格相对最低的分布格局。研究创新:提出了考虑产品价格关联性的空间CPD模型和以拉氏指数与派氏指数方差加权的EKS-Fisher\*方法,构建改进的CPD-EKS两步估算法。研究价值:改进了地区购买力平价估算方法,发展了空间价格指数理论。

　　【SC05】跨国增长实证研究的模型不确定性问题：机器学习的视角　　刘岩、谢天（2019），《中国工业经济》，第12期，第5-22页。

　　过去30年间跨国经济增长实证研究领域提出了近150个增长决定因素,而全球200余个国家(地区)的样本限制意味着在总结跨国增长经验时必须考虑模型不确定性问题。有别于该领域经典文献所使用的传统计量方法,本文探索了新近的机器学习方法对该问题的分析所可能有的贡献。本文从小样本、变量排序、非线性特征三个角度说明具有一定特征的机器学习方法较传统计量方法可以更有效地处理模型不确定性问题。利用标准的跨国经济增长数据集,本文考察了10种常见机器学习方法的应用表现,并与3种传统计量方法作了比较。结果显示,套袋法与随机森林法及两者的拓展均能在小样本条件下对经济增长决定因素进行有效排序,灵活捕捉数据的非线性特征,让模型不确定性问题化繁为简,得出更为清晰、稳健的结论。本文旨在说明,机器学习方法的应用有助于跨国增长经验事实的归纳与理解,对于补充传统计量方法的局限与不足具有一定的潜力。

　　【SC06】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国际关联及其解释　　肖小勇、黄静、田清淞（2019），《国际贸易问题》，第4期，第76-91页。

　　基于各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借鉴Diebold和Yilmaz提出的关联测量框架,本文从总关联、总定向关联和两两定向关联三个方面考察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国际关联及其时变特征,并探索了国际关联的主要影响因素。研究结论:(1)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国际总关联度为37. 4%,且在样本期内呈现三个明显的急剧上升期,分别对应以下事件:2001年9月"9. 11恐怖袭击事件"、2008年9月雷曼兄弟破产、2016年6-11月英国脱欧公投和美国总统大选;(2)美国、韩国、德国、法国、加拿大受其他国家不确定事件影响较大,且该五国的不确定事件对其他国家的影响也较大。特别地,美国是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最大发送者,而日本和墨西哥为最大接受者;(3)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两两定向关联存在国别差异。美国和韩国间具有强关联性,且处于同一区域的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三国间和德国、英国、法国三国间的关联性也较强;(4)地理位置相邻、同属于"富人俱乐部"和发送国影响力是产生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国际关联的主要因素。

　　【SC07】结构模型在国际贸易研究中的应用　　王子、周雁翎（2019），《中国工业经济》，第4期，第62-80页。

　　结构模型(Structural Model)又称为结构计量模型(Structural Econometric Model),是将正式的经济学模型和统计模型(Statistical Model)结合,用于估计描述现实的深层参数(Deep Parameters),模拟现实世界,以便合理地评估政策效果的实证工具。结构模型对于国际贸易研究尤其重要,因为国际贸易理论和政策评估通常涉及复杂的一般均衡效应和福利分析,需要将多国多部门的因素在统一的结构框架下进行量化,从而得到较为可靠的政策建议。本文全面介绍了结构模型的概念、方法、优势以及局限,并在此基础上,具体介绍了结构模型在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异质性企业贸易模型,以及动态空间模型(Dynamic Spatial Model)等三个前沿领域中的应用,梳理各领域的重要文献,发掘现有研究的不足和未来的研究方向。

　　【SC08】贸易强国的测度：理论与方法　　姚枝仲（2019），《世界经济》，第10期，第3-22页。

　　本文使用贸易份额与一个价格因子的乘积构建贸易强国指数,其中价格因子是一国贸易品价格与世界平均价格之间的比价。该指数能测度一国得自贸易利益的相对大小,而在国际贸易中能比其他国家获得更多的贸易利益正是贸易强国的本质特征。该指数还能很好地抓住贸易强国的另一个特征,即从贸易大国走向贸易强国在很大程度上是从廉价产品出口国走向优质高价产品出口国的过程。对该指数的分解和进一步分析,能够用于理解各国贸易利益的来源、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以及一个国家走向贸易强国的发展路径。该指数还为贸易结构分析提供了新的视角。

　　【SC09】贸易强国指数的跨国经验分析　　毛日昇（2019），《世界经济》，第10期，第23-48页。

　　本文采用1996-2016年联合国HS6位码贸易产品数据和OECD\_TiVA贸易增加值数据,在国家、产业及产品层面测算对比了中国、美国、德国和日本贸易综合竞争力变化状况。测算结果表明:首先,中国综合贸易竞争力指数总体上已经先后超越日本和德国,但无论从出口还是进口角度来看,直到2016年中国与美国贸易竞争力指数仍然存在显著差距,在进口贸易竞争力方面的差距尤为明显。其次,中国贸易竞争力指数上升主要来自出口和进口市场份额的快速扩张,德国和日本贸易品相对价格优势对贸易竞争力提升贡献度突出。最后,中国出口产品质量升级速度显著高于发达国家,但进口产品的相对竞争力没有得到显著提升。

　　【SC10】增加值贸易视角下中国区际贸易成本的测算与分解　　袁凯华、彭水军、余远（2019），《统计研究》，第2期，第63-75页。

　　本文在Novy(2013)的基础之上,利用1997年、2002年和2007年区域间投入产出表,首次基于增加值贸易视角进行了我国区际贸易成本变动的测算与分解。结果显示:首先,不同于传统贸易流量的测度,基于增加值贸易视角的测度表明,1997-2007年的区际贸易成本不仅没有上升,反而大幅下降。其次,尽管当前的区际贸易成本有所下降,但是这种下降主要体现为以内陆地区和初级产品带动的低端化整合。最后,进一步利用双边分解,本文发现低端化整合的迹象可能在于邻区偏少、产业同构度过高与政策缺失下,东部沿海地区更多利用国外需求进行替代所致。随着东部沿海地区的对外依赖程度提升,区际分工整合将会面临"初级产品分工整合加快→服务行业过度出口→遭受出口俘获→初级产品分工整合进一步加快"的恶性循环。因此,进一步转变发展观念、扭转市场分割激励、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才能从根本上提升区际整合质量。

　　【SC11】1995—2011年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动态演进过程分析——基于Ti VA数据库的新兴市场国家比较　　李正、武友德、胡平平（2019），《国际贸易问题》，第5期，第69-84页。

　　基于OECD-WTO联合发布的Ti VA统计数据,利用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关联度与产业演进系数等量化方法,对1995—2011年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演进过程与趋势特征开展了实证检验,并在与其他新兴市场国家的比较中明晰所处位置与类型。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及其他新兴市场国家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参与表现出明显的趋同性,参与度较高且为上升、收敛态势,中国制造业参与的进度更大、程度更深、水平更高;经历了振荡发展、加速融入、平稳调整等三个发展阶段,表现为"倒S形"发展过程,并在前向、后向两个方向上以渐趋平衡的关联度嵌入全球产业链,更具网络的稳固性与根植性;受此影响,中国及新兴市场国家的制造业内部随之出现不同程度的产业调适;中国的产业演进突出表现在由低技术产业向高技术产业演进,低技术产业仍然偏高,中高技术产业发展不足,属于跨梯度演进模式。这一演进特征与中国自身所处发展阶段与制造业总体水平紧密相关,也受到中国全面推进对外开放、加大工业化步伐、调整产业结构与加入WTO等政策因素的影响。

　　【SC12】中国自由贸易区优惠原产地规则修正性限制指数体系的构建——兼论中国自由贸易区优惠原产地规则的合理性　　成新轩、郭志尧（2019），《管理世界》，第6期，第70-80、108页。

　　本文以中国自由贸易区为研究对象,在对优惠原产地规则限制程度研究文献进行梳理的基础上,引入制度性原产地规则中的累积规则、微量条款及原产地证书等要素,结合中国自由贸易区的特征,提出了适合测定中国自由贸易区优惠原产地规则限制程度的一套体系。以此为依据,计算了5个具有代表性的中国自由贸易区优惠原产地规则的限制程度,以及中国自由贸易区制造业优惠原产地规则的限制指数和中国对智利、中国对新西兰缔结自由贸易区前后贸易附加值的变化;据此论证了中国自由贸易区优惠原产地规则的合理程度,分析了其中存在的问题,进而提出改进的措施。

　　【SC13】中国出口增长的四维动态结构分解及影响因素研究　　张凤、冯等田、刘迪（2019），《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第9期，第61-80页。

　　研究目标:对中国出口增长进行四维(进入、退出、存活和深化)出口动态结构分解并分析其因素决定。研究方法:利用中国1996～2015年HS6位数出口数据,运用结合出口持续期的国际先进分解方法对出口增长结构进行分解并分析其因素决定。研究发现:(1)集约边际占据了整体出口增长的99%以上,受金融危机影响较大;出口进入受内生技术改革影响较大;(2)出口进入占比更高的是新兴市场国家,最低的是OECD国家;而出口退出占比最高的是发展中国家,最低的是OECD国家;新兴市场国家平均存活贸易关系数最多,而发展中国家最低;发展中国家平均深化增长最多,新兴市场国家最低;(3)出口进入和退出占比更高的是中、高技术类产品;尽管低技术产品占中国出口存活关系多数,但中、高技术产品平均深化金额更高,实证检验进一步印证了这一结论;(4)差异性产品的出口进入和退出都更温和且其产品贸易关系的存活个数更多,平均深化金额更高,实证检验进一步印证了这一结论;(5)国家层面的GDP、加工贸易比重、实际有效汇率、与出口经验有关的变量、加入WTO、FTA总体上有利于促进企业出口,优化出口结构,但距离、出口目的国是内陆国家、全球金融危机等对企业出口有显著负面影响。上述结论在采用不同的计量方法时结论基本稳健。研究创新:结合出口持续期对出口增长结构进行四维动态分解并分析其因素决定。研究价值:能够更准确刻画中国出口微观结构,并为中国优化出口结构及鼓励和支持产品研发和科技创新提供决策价值

　　【SC14】汇率预测及其经济基本面：基于多元自适应可变窗算法的构建　　李欣珏、牛霖琳（2019），《统计研究》，第9期，第43-55页。

　　在人民币国际化不断推进、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加强的背景下,构建具有优良预测能力的人民币汇率预测模型意义重大。参数模型对汇率预测的能力不仅取决于模型设定是否正确,同时还取决于能否迅速探测参数的结构性变化以使用最佳信息估计模型参数。本文构建了多元自适应可变窗算法以及时监测模型参数的时变特征,探测最大化参数同质区间。结果显示:①在中长期(3至24个月)的美元、欧元、英镑和日元兑人民币汇率的样本外推预测中,多元自适应可变窗算法能显著优于随机游走模型、购买力平价模型、弹性货币模型、利率平价模型、泰勒规则模型与偏移型泰勒规则模型这六种汇率预测主流模型,其预测能力也显著优于实时窗宽选择算法与自回归模型;在美元兑人民币汇率中长期(3至24个月)预测中,其预测误差MAE度量相比于次优模型能降低25%～50%。②多元自适应可变窗算法能迅速捕捉美元、欧元、英镑和日元兑人民币汇率的拐点,预测人民币汇率走向并刻画人民币汇率的周期性变化,其长期(向前9个月)方向性趋势样本外推预测精度比次优模型提高了16%～40%。③断点前后的汇率动态结构性变化显示"811"汇改促进了经济基本面对汇率预期重要性的显著提升与市场风险偏好的转变。"811"汇改之后,人民币汇率预期更易受外部冲击影响。加速利率市场化建设、提高国内收入、稳定物价、坚持带管制的浮动汇率制度与有效的资本管制相结合等措施对促进汇率市场化、防止汇率风险具有重要意义。

　　【SC15】中国银行业跨境联系的测度与分析——兼论国际银行业网络结构的动态特征　　陈梦根、赵雨涵（2019），《经济研究》，第4期，第49-66页。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一个重要教训是对跨境金融风险传染缺乏有效监测手段,跨境金融联系已成为危机信息缺口的重要方面。本文根据国际清算银行1994—2016年信贷统计数据,采用复杂网络理论测度和分析中国银行业的跨境联系,以及国际银行业网络结构的动态特征。实证分析表明,中国银行业在国际金融体系中地位不断提升,金融稳定性逐步增强,对冲击的敏感性降低。随着全球化和国际经贸合作的加深,20世纪90年代以来各国银行间跨境联系愈发紧密,但不同时期银行跨境联系存在结构性变化。受地缘因素等影响,国际银行业网络结构呈现出地理区域化特征,且该趋势不断增强,而危机发源地或受危机影响严重的国家及地区在跨境金融联系中往往表现出特殊性,国际影响力下降,以欧美国家为主导的世界金融格局正悄然发生变化。

　　【SC16】商业银行国际化水平测算模型的改进与应用　　蒋海曦、王明哲、李天德（2019），《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第7期，第137-155页。

　　研究目标:修正学者在2015年提出的商业银行国际化水平测算模型,计算2008～2017年国内外典型商业银行国际化水平并进行预测分析。研究方法:利用国内外各典型商业银行年报数据,基于AHP法和Daniel平稳性检验法进行计算分析。研究发现:国际化水平指数较高的商业银行在逐渐降低其国际化水平;国际化水平指数处于中等范围的商业银行基本保持稳定;国际化水平指数较低的商业银行在稳步扩大其国际化水平。从长远来看,为了达到控制风险、扩大发展的目标,商业银行较为合适的国际化水平指数应控制在15%～25%。研究创新:引入新的方法修正原有模型;对未来三年各商业银行的国际化水平指数进行了预测。研究价值:分析商业银行国际化水平的变动趋势,为政策的调整提供数理依据。

　　【SC17】跨境资本流动、度量方法筛选与金融风险防范　　刘柏、张艾莲、胡思遥（2019），《南开经济研究》，第5期，第65-80页。

　　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是保障经济正常运行的重要工作,针对跨境资本流动的有效度量是稳定金融市场、制定金融监管长效机制的基础。本文运用六种不同的度量方法刻画中国2001年1月至2016年12月跨境资本流动规律,并采用主成分分析法甄别不同度量方法之间的相关关系以便确定中国资本流动度量的有效性。实证结果表明,总量规模法、实际利率差异法、Haque-Montiel法对中国资本流动度量解释能力较高。实际利率差异法和Haque-Montiel法根源于利率决定模型,利率的调控不仅要基于纵向水平的不同,而且要涉及横向主要贸易国之间的利率差异。需时时监控规模指标,既包括单一的总量指标,还涵盖各子项目的资本流入和流出指标,尤其是占比较高的股权、贸易信贷等资本流动,从而有效防控和化解金融风险。

　　【SC18】数字经济卫星账户：国际经验及中国编制方案的设计　　杨仲山、张美慧（2019），《统计研究》，第5期，第16-30页。

　　数字经济测度问题是信息革命下宏观经济统计面临的新挑战,为了准确核算数字经济发展规模及其对宏观经济运行的贡献程度,构建数字经济卫星账户(DESA)是一项较为可行的方案。本文在总结OECD等国际组织及美国、新西兰等国家对数字经济测度及DESA研究经验的基础上,结合中国数字经济的现状,尝试提出中国DESA的整体框架,剖析了DESA所涉及的基本概念、中心框架、核心表式与数据清单,明确了编制数字经济的静态总量指标与直接贡献指标,探讨了DESA的实例编制方法,以期为中国DESA的编制及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完善提供借鉴。

　　【SC19】中国数字经济卫星账户框架设计研究　　向书坚、吴文君（2019），《统计研究》，第10期，第3-16页。

　　数字经济日新月异的发展对现行统计核算体系提出了挑战。本文主要针对其在经济生产、收入分配和资本核算方面的挑战,研究了中国数字经济卫星账户框架的设计原理及可行性。首先,探讨了数字经济活动对现有核算体系中生产核算、收入分配核算、资本核算、金融核算的影响,包括数字经济核算与中心框架中产业单位、交易特征、生产者、生产范围、收入分配等的关系。然后,基于国内外数字经济相关分类和中国核算实践分析了中国产业、产品分类的国际可比性和可行性,形成了对数字经济生产核算、资金流量核算和资本核算的专门性设计,并构建了一般性的核算指标。在框架设计的基础上,对2012-2017年中国数字经济主要产业部门的增加值进行了初步测算。最后,结合中国数字经济研究现状,对中国开展数字经济核算工作提出了建议,即建议深化中国数字经济卫星账户核算体系及相应的核算方法体系、研究开发中国数字经济高频大数据的获取方法、完善中国数字经济产业产品分类标准及相关统计规章制度。

　　【SC20】国家数字竞争力指数构建与国际比较研究　　吴翌琳（2019），《统计研究》，第11期，第14-25页。

　　当前数字化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领域深度融合,引领改革发展、创新驱动的未来方向,为提升国家竞争力乃至综合国力注入强大动能。本文对传统国际竞争力"钻石模型"进行扩展,构建国家数字竞争力评价体系,整合国际权威数据,系统评估全球数字竞争力状况,按照发展阶段和发展模式两个维度进行国家划分,研判中国数字竞争力在全球的位置、差距及影响因素,为"数字强国"建设提供基础数据支撑和国际参考。

　　【SC21】国际官方统计的新发展　　鲜祖德、程子林、高婷（2019），《统计研究》，第6期，第3-14页。

　　联合国统计委员会会议是国际统计界的盛会,集中反映全球官方统计的最新成果和进展。本文对联合国统计委员会第50届会议最主要的若干问题,包括《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数据和指标、官方统计基本原则、国家质量保证框架、官方统计使用大数据、国民账户体系、统计用途商业登记册、价格统计、住户调查、国际比较方案等领域的新发展进行了概述,从4个方面提出了国际官方统计的新发展对中国政府统计工作的启示。

　　【SC22】文本大数据分析在经济学和金融学中的应用：一个文献综述　　沈艳、陈赟、黄卓（2019），《经济学（季刊）》，第4期，第1153-1186页。

　　本文对文本大数据分析在经济学和金融学中的应用进行综述。文本大数据具有来源多样化、数据量增长快和高频等特征,为经济学和金融学研究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本文梳理了文本大数据的信息提取步骤,总结了词典法、机器学习方法和深度学习方法的实现原理和技术特点,并对文本大数据在经济学和金融学中的应用研究的数据来源、处理方法和实证结果进行了全面梳理。本文还讨论了基于文本大数据的实证分析的新特征和未来研究趋势。

　　【SC23】一种嵌入空间计量分析的全要素生产率核算改进方法　　范巧、郭爱君（2019），《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第8期，第165-181页。

　　研究目标:在空间计量分析框架下对全要素生产率核算的索洛余值法做出改进,从而使核算结果更为精准。研究方法:将索洛余值法中的生产函数由非空间模型拓展为通用嵌套空间模型及其退化模型,并考察时空权重矩阵内生或外生设定和投入要素二元或多元假设下全要素生产率的核算方法,还将之应用于省级层面全要素生产率核算的算例中。研究发现:嵌入空间计量分析的索洛余值改进方法相比传统方法更为精准,其关键在于通用嵌套空间模型及其退化模型的优选过程,且不同最优模型对应不同的要素投入份额计算公式。研究创新:在空间计量分析框架下实现了对全要素生产率核算的索洛余值法的改进。研究价值:有利于实现空间计量分析和索洛余值法的有机结合。

　　【SC24】中国政府资产负债核算的理论与实践问题　　王毅、郑桂环、宋光磊（2019），《财贸经济》，第1期，第1-19页。

　　通过编制政府资产负债表,提供完备的数据基础和翔实的核算信息,分析政府运行风险,对于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和金融稳定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从编制现状看,已有的研究对我国政府资产负债表核算进行了积极探索,但编制政府资产负债表的核算理论基础不完备,尚未建立完整的核算体系。在当前的经济发展阶段,中国政府层级与组织结构的复杂性,增加了中国政府资产负债核算理论体系构建的困难程度。本文从政府部门的定义与内涵、资产负债范围划分与分类、核算原则的确定、核算理论体系与国民经济核算(SNA)衔接等几个方面,研究构建中国政府资产负债核算理论体系需要解决的问题以及存在的困难,旨在为下一步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府资产负债核算基本理论体系提供重要基础,并从流量和存量的结合、分析框架建设、数据基础治理、隐性债务和或有负债等视角提出了思路,以期为政府资产负债表的编制及应用提供理论指导。

　　【SC25】行业结构优化的测度及影响因素分析　　武力超、张馨月（2019），《统计研究》，第5期，第54-68页。

　　制造业行业结构优化是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环节。本文基于MVE原理,测算了各国的最优制造业行业结构,并在此基础上量化了各国现有制造业行业结构与最优行业结构间的距离,分析了影响制造业行业结构优化的因素。本文研究表明,国家金融发展、贸易开放及制度环境是影响制造业行业结构优化的重要因素。基于行业特征的研究发现外部流动性需求高、生产更为分散的行业,其结构优化受金融发展的影响更为显著;对外贸易依赖度高的行业以及所处营商环境更为恶劣的行业分别受国家贸易开放及制度环境优化的影响更大,行业结构调整更为迅速。本文的研究结论为各国以行业结构调整促进经济平稳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改进方向。

　　（二）世界经济统计学2019年最佳英文论文TOP10候选论文

　　【SE01】Vulnerable Growth　　Adrian, T., Boyarchenko, N. & iannone, D. (2019).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9(4), 1263-1289.

　　We study the conditional distribution of GDP growth as a function of economic and financial conditions. Deteriorating financial conditions are associated with an increase in the conditional volatility and a decline in the conditional mean of GDP growth, leading the lower quantiles of GDP growth to vary with financial conditions and the upper quantiles to be stable over time. Upside risks to GDP growth are low in most periods while downside risks increase as financial conditions become tighter. We argue that amplification mechanisms in the financial sector generate the observed growth vulnerability dynamics.

　　【SE02】Missing Growth from Creative Destruction　　Aghion, P., Bergeaud, A., Boppart, T., Klenow, P. & Li, H. (2019).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9(8), 2795-2822.

　　For exiting products, statistical agencies often impute inflation from surviving products. This understates growth if creatively-destroyed products improve more than surviving ones. If so, then the market share of surviving products should systematically shrink. Using entering and exiting establishments to proxy for creative destruction, we estimate missing growth in US Census data on non-farm businesses from 1983 to 2013. We find missing growth (i) equaled about one-half a percentage point per year; (ii) arose mostly from hotels and restaurants rather than manufacturing; and (iii) did not accelerate much after 2005, and therefore does not explain the sharp slowdown in growth since then.

　　【SE03】Evolving Measurement for an Evolving Economy: Thoughts on 21st Century US Economic Statistics　　Jarmin, R. (2019).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33(1), 165-184.

　　The system of federal economic statistics developed in the 20th century has served the country well, but the current methods for collecting and disseminating these data products are unsustainable. These statistics are heavily reliant on sample surveys. Recently, however, response rates for both household and business surveys have declined, increasing costs and threatening quality. Existing statistical measures, many developed decades ago, may also miss important aspects of our rapidly evolving economy; moreover, they may not be sufficiently accurate, timely, or granular to meet the increasingly complex needs of data users. Meanwhile, the rapid proliferation of online data and more powerful computation make privacy and confidentiality protections more challenging. There is broad agreement on the need to transform government statistical agencies from the 20th century survey-centric model to a 21st century model that blends structured survey data with administrative and unstructured alternative digital data sources. In this essay, I describe some work underway that hints at what 21st century official economic measurement will look like and offer some preliminary comments on what is needed to get there.

　　【SE04】The Value of US Government Data to US Business Decisions　　Hughes-Cromwick, E. & Coronado, J. (2019).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33(1), 131-146.

　　The US government is a major producer of economic and financial data, statistics, analysis, and forecasts that are gathered, compiled, and published as public goods for use by citizens, government agencies, researchers, nonprofits, and the business community. There is no market transaction in the publication and dissemination of these government data and therefore no market-determined value.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outline and augment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value of government data for business decision-making. We provide an overview of the topic, including results from government reports and a private sector survey. We then provide concrete examples of how these government data are used to make business decisions focusing on three sectors: automotive, energy, and financial services. Examples of new initiatives by the federal government to open access to more data, exploiting technology advances associated with the internet, cloud storage, and software applications, are discussed. With the significant growth in the digital economy, we also include discussion and insights around how digital platform companies utilize government data in conjunction with their privately generated data (or "big data") to foster more informed business decisions.

　　【SE05】Accounting for real exchange rates using micro-data　　Crucini, M. & Landry, A. (2019).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oney and Finance, 91, 86-100.

　　The classical dichotomy predicts that all of the time-series variance in the aggregate real exchange rate is accounted for by non-traded goods in the consumer price index (CPI) basket because traded goods obey the Law of One Price. In stark contrast, Engel (1999) claimed the opposite: that traded goods accounted for all of the variance. Using micro-data and recognizing that final good prices include both the cost of the goods themselves and local, non-traded inputs into retail such as labor and retail space, our work re-establishes the conceptual value of the classical dichotomy. We also carefully show the role of aggregation, consumption expenditure weighting and assignment of covariance terms in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our findings and those of Engel.

　　【SE06】On the Controversies behind the Origins of the Federal Economic Statistics　　Rockoff, H. (2019).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33(1), 147-164.

　　Our federal economic statistics originated in the economic and political division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bitter debates over economic policy they engendered at the end of the 19th century and during the world wars and Great Depression. Workers were angry because they believed that they were being exploited by robber barons who were capturing all of the benefits of economic growth, while employers were just as sure that the second industrial revolution had brought workers an unparalleled increase in real wages. Other debates centered on the effects of unrestricted immigration on wages and employment opportunities of native-born Americans, on the effects of tariffs on prices paid by consumers, on the effects of frequent financial panics on employment, and, during the world wars, on the effects of wage and price controls on the living standards of workers. Participants on all sides of these debates believed that nonpolitical and accurate statistics constructed by experts would help to win support for the policies they favored. In most cases, the development of these statistics was led by individuals, private organizations, and state governments, although the federal government eventually took over the role of producing these statistics on a regular basis. Here I provide brief histories of the origins of US statistics on prices, national income and product, and unemployment to illustrate this story.

　　【SE07】Nowcasting global economic growth: A factor‐augmented mixed‐frequency approach　　Ferrara, L. & Marsilli, C. (2019). The World Economy, 42(3), 846-875.

　　Facing several economic and financial uncertainties, assessing accurately global economic conditions is a great challenge for economists.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proposes within its periodic World Economic Outlook report a measure of the global GDP annual growth, that is often considered as the benchmark nowcast by macroeconomists. In this paper, we put forward an alternative approach to provide monthly nowcasts of the annual global growth rate. Our approach builds on a Factor-Augmented MIxed DAta Sampling (FA-MIDAS) model that enables (i) to account for a large monthly database including various countries and sectors of the global economy and (ii) to nowcast a low-frequency macroeconomic variable using higher-frequency information. Pseudo real-time results show that this approach provides reliable and timely nowcasts of the world GDP annual growth on a monthly basis.

　　【SE08】Re-estimation of China-EU trade balance　　Jiang, X., Kong, Y., Li, X., Yang, C. & Chen, X. (2019). China Economic Review, 54, 350-366.

　　Significant discrepancy exists between official Chinese and EU trade statistics on the magnitudes of the China-EU trade in goods as well as in services. While the discrepancy of China-U.S. trade surplus has been thoroughly studied by scholars and policymakers, the discrepancy of China-EU trade surplus is barely discussed in literatures. This may lead to seriously bias in understanding China-EU trade relationship, and even cause unnecessary trade friction. In this paper, we discuss the reasons behind the discrepancy of China-EU trade and quantify the extent to which the discrepancy is contributed by transportation costs, re-exports and their markups. We also employ the input-output tables of both EU and China, and measure the China-EU trade balance of goods and services in both domestic value-added (DVA) terms as well as in gross terms. The discrepancy of China-EU trade balance in goods (and services) still exists after adjustments, but is significantly reduced. With the adjustments on price and re-exports, in 2016, the discrepancy of China-EU trade in goods and services of Chinese release over EU release would shrink from an initial estimation of US$90.6 billion to an estimation of US$20.4 billion in gross terms, and further to US$15.8 billion in value-added terms.

　　【SE09】The Power of Ranking: The Ease of Doing Business Indicator and Global Regulatory Behavior　　Doshi, R., Kelley, J. & Simmons, B. (2019).T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73(3), 611-643.

　　We argue that the World Bank has successfully marshaled the Ease of Doing Business (EDB) Index to amass considerable influence over business regulations worldwide. The Ease of Doing is a global performance indicator (GPI), and GPIs—especially those that rate and rank states against one another—are intended to package information to influence the views of an audience important to the target, such as foreign investors or voters, thus generating pressures that induce a change in the target's behavior. The World Bank has succeeded in shaping the global regulatory environment even though the bank has no explicit mandate over regulatory policy and despite questions about EDB accuracy and required policy tradeoffs. We show that the EDB has a dominating market share among business climate indicators. We then use media analyses and observational data to show that EDB has motivated state regulatory shifts. States respond to being publicly ranked and some restructure bureaucracies accordingly. Next we explore plausible influence channels for the EDB ranking and use an experiment involving US portfolio managers to build on existing economics research and examine whether the rankings influence investor sentiment within the experiment. Using a case study of India's multiyear interagency effort to rise in the EDB rankings, as well as its decision to create subnational EDB rankings, we bring the strands of the argument together by showing how politicians see the ranking as affecting domestic politics, altering investor sentiment, and engaging bureaucratic reputation. Overall, a wide variety of evidence converges to illustrate the pressures through which the World Bank has used state rankings to achieve its vision of regulatory reform.

　　【SE10】What do we know about the global financial safety net? A new comprehensive data set　　Scheubel, B. & Stracca, L. (2019).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oney and Finance, 99: Article 102058.

　　This paper provides a comprehensive database covering four elements of the GFSN (foreign exchange reserves, IMF financing, central bank swap lines and regional financing arrangements) for over 150 countries in the sample period 1960–2014. It also presents some key stylised facts regarding the provision of GFSN financing. Finally, it concludes with some avenues for further research on the possible evolution of the GFSN. An update of the data including years 2015-2018 will also be provided online.

　　【SE11】The world predictive power of U.S. equity market skewness risk　　Chen, J., Jiang, F., Jiang, F., Xue, S. & Yao, J. (2019). . equity market skewness risk.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oney and Finance, 96, 210-227.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the cross-country impact of U.S. equity market skewness risk. We find that a large decrease in the U.S. market skewness significantly predicts higher future returns on international equity markets. The predictability remains significant after controlling for a set of U.S. and local forecasting variables. Furthermore, we find strong predictability in- an out-of-sample setting and the predictability delivers a large economic value. The U.S. market skewness also forecasts U.S. economic recessions and international market conditions, consistent with the international three-moment capital asset pricing model (three-moment CAPM) and the intertemporal capital asset pricing model (ICAPM).

　　【SE12】A Race to the Top? The Aid Transparency Index and the Social Power of Global Performance Indicators　　Honig, D. & Weaver, C. (2019).A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73(3), 579-610.

　　Recent studies on global performance indicators (GPIs) reveal the distinct power that nonstate actors can accrue and exercise in world politics. How and when does this happen? Using a mixed-methods approach, we examine the impact of the Aid Transparency Index (ATI), an annual rating and rankings index produced by the small UK-based NGO Publish What You Fund. The ATI seeks to shape development aid donors' behavior with respect to their transparencya€”the quality and kind of information they publicly disclose. To investigate the ATI's effect, we construct an original panel data set of donor transparency performance before and after ATI inclusion (2006a€“2013) to test whether (and which) donors alter their behavior in response to inclusion in the ATI. To further probe the causal mechanisms that explain variations in donor behavior we use qualitative research, including over 150 key informant interviews conducted between 2010 and 2017. Our analysis uncovers the conditions under which the ATI influences powerful aid donors. Our mixed-methods evidence reveals how this happens. Consistent with Kelley and Simmons's central argument that GPIs exercise influence via social pressure, we find that the ATI shapes donor behavior primarily via direct effects on elites: the diffusion of professional norms, organizational learning, and peer pressure.

　　【SE13】Globalization and the growing defects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statistics　　Linsi, L. & Mügge, D. (2019).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26(3), 361-383.

　　Official international economic statistics are generally considered accurate and meaningful gauges of cross-border flows of trade and capital. Most data users also assume that the quality of the underlying data keeps improving over time. Through an extensive review of the national accounting literature, archival research, two dozen interviews with high-level statisticians, and a series of data quality tests, we evaluate this common view for the primary source of data on trade and capital flows: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a€?s Balance of Payments (BOP) Statistics. Our assessment paints a less rosy picture: reported figures are far less accurate than they are typically imagined to be and often do not correspond to the theoretical concepts with which users associate them. At the same time, measurement quality deteriorates over time as the transnationalization of economic production gradually undermines the validity of BOP statistics. Our findings raise serious questions about the widespread use of these numbers, with their deceptive pretense to accuracy, in scholarly research and public debate about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SE14】Magic mirror in my hand … How trade mirror statistics can help us detect illegal financial flows　　Gara, M., Giammatteo, M. & Tosti, E. (2019). The World Economy, 42(11), 3120-3147.

　　Misreporting tricks of different sorts applied to the transfer of goods between different countries are typically exploited by criminals worldwide for money laundering ends. The main international anti‐money laundering organisations started paying attention to this phenomenon, dubbed “trade‐based money laundering” (TBML), a long time ago, but the failure to develop appropriate analytical tools has reportedly dogged preventive actions. Nonetheless, literature has widely advocated the possibility that the analysis of inconsistencies in mirrored bilateral trade data could provide some help. By building on previous contributions in the field, this work sets up a model factoring in the main structural determinants of discrepancies between mirrored data concerning Italy's 2010 to 2013 external trade at a highly detailed (6‐digit) level of goods classification for each partner country. Point estimates of freight costs are used to net each observation of the corresponding cif/fob discrepancy. The regression estimates are then deployed in order to compute TBML risk indicators at a country/4‐digit product level. Based on the indicators, rankings of countries and product lines can be compiled, which may be used for a risk‐driven search of potential illegal commercial transactions.

　　【SE15】Pitfalls in the use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statistics　　O'Mahony, C. & Barry, F. (2019). The World Economy, 42(10), 2835-2853.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 ) statistics are widely used to study the impact of international capital movements and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 (MNE ) activities. FDI intensity is also an important indicator of globalisation and economic integration. Datasets spanning long time periods and with broad country coverage have been employed in numerous studies to analyse various aspects of the determinants and consequences of FDI . Focusing on a relatively homogeneous group of six Western European EU countries, the present study finds major inconsistencies in the construction and coverage of these data both through time and across countries, leading to large discrepancies. Asymmetries will be far greater for broader groups of more economically and institutionally diverse countries. This study recommends extreme caution in drawing conclusions based on FDI data.